

本期话题：访谈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

访谈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

□ 顾晓光 /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12.07.001

采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所长吴建中先生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想法，正值上海图书馆2012年七月庆祝六十华诞，在这个时候将其付诸实现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是中国图书馆界的风云人物，有三十年馆龄，已做了十年馆长，受过日语、图书馆学以及文学的熏陶，曾留学英国，担任过国际图联管委会和专业委员会委员（2001-2005）、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他除了长期负责上海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外，著作颇丰，是业界高产的学者。这些外在的标签被人提起过多次。

作为后学，我对吴馆长的印象是他有着优秀的职业素养和温文尔雅的处事哲学。早在十年前，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图书馆员曾经去信询问有关一个国际会议的事情，想必他现在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淹没在回复过多次不知名人士的专业询问中。《数字图书馆论坛》正式创刊七年多，刊登过多篇上海图书馆同仁的文章，有的文章就是拜托他的推荐。这次采访结束前，吴馆长特意告诉我，如果说上海图书馆有了一些成绩，也是在他们整个班子领导下集体共同取得的。

作为国内第一家图情一体化的大型信息服务机构，上海图书馆的研究能力在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合并后得到了增强。从《数字图书馆论坛》最近五年刊登过的上海图书馆同仁的文章看，上海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研究上一直走在国内的前列，比如移动图书馆、电子书阅读器、图书馆2.0、DC元数据、古籍数字化等，2011年4月出版的OCLC2010年度报告《图书馆的认知度》中文版也是由上海图书馆同仁翻译而成的。

作为上海图书馆的掌门人，吴馆长和他的同事在这些年建立并完善了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服务体系、上海公共情报服务平台等重要的信息服务项目，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人性化的服务模式，向“世界级城市图书馆”的方向迈进。

在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访谈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吴馆长对于当前国内图书馆界发展的忧虑和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憧憬。“机遇与挑战”，是对过去互联网环境下信息服务多元冲击的思考；“生于忧患”，是对现在的鞭策；而“转型与超越”，是对未来的自信。

今年五月份，吴馆长出版了《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一书，这是他十几年来第一次通过专著的形式重新思考图书馆的发展。他提出了“人”、“资源”和“空间”的图书馆三要素，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用现代化技术方式收集整合全媒体资源和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价值。在“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学界，本书不仅收集、整理了国外发达图书馆的多样案例，而且将大量的篇幅放在探索图书馆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过渡的可能模式，难能可贵。

为了准备访谈，我重新翻看吴馆长在1998年出版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发现书中提到的21世纪图书馆发展的种种可能到今天基本都得到了验证，且在当前还有参考的价值。正如他在此次访谈中所讲的“混沌是永恒的，秩序是相对的”一样，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是永恒的，而现实的应变是相对的。图书馆作为人们终生学习的课堂的使命已渐行渐远，我们现在的努力也许是希望图书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在别处”，那里肯定有一座图书馆。

顾晓光：虽然您已经出版了二十余本书，其中对于图书馆进行全面思考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98年出版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后来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版），为什么会选择14年后，出版《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这本书，进一步思考图书馆的发展？

吴建中：十几年前我写了这本《21世纪图书馆新论》，尽管它只是对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在当时，大家对国外的图书馆事业了解不够，受的主要还是我们过去传统图书馆学的影响。相对来说，那个时候我们图书馆学有非常重的“书本位”印记，一切都是围绕书展开的。所以，当时有一种雄心或者说野心吧，是把它当成开眼界的一本书。它把国外的东西介绍到国内，应该说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我们不知道国外的图书馆是如此蓬勃发展的，所以通过这本书从各个侧面把它体现出来。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已经比较了解国外的情况，新一代的图书馆馆长外文都很好，他们对于国外的情况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没有必要把国外的东西再拿过来介绍了。这些年我在思考图书馆是不是应该有个Change（改变）。我国图书馆这十几年的发展总体上还是量的发展，没有质的变化。所谓量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建筑，过去很陈旧，现在很多地方很豪华，甚至超过国际水平了。还有一些设施，也超过国际水平，像24小时自助借还机这样的设备，展示了图书馆现代技术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质的变化并没有出现，至少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

写这本书有两个方面的冲动。从中国的整个大环境来讲，创新、转型是时代的大背景、大趋势。图书馆有没有跟上去？我认为没有跟上去。图书馆还在沉醉于大发展、大投入的喜悦当中。投入很多、很大，但是我发现很多投入都没有在点子上，有些投入似乎偏离主线，投在不可持续的项目和设备上了。这些问题激发我把这一想法写出来。也就是说，图书馆如何向质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方面的冲动。

有人预测，2020年，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的销售额处在一个Tipping Point（临界点），也就是说各占50%。我们知道，数字出版的增长是几何级的，达到50%的比例以后，55%、60%的比例很快就上去了。为什么要提临界点呢？我举个例子，十几年前，我在台湾地区，见



上海图书馆外景

到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是其他专业的人士，他说他感到很苦恼，看不清图书馆发展的走向。电子化、虚拟化资源应该占多大比例，纸质资源占主导的现状将维持到什么时候？他当时追求的只是自动化，比如像Horizon、Ex Libris之类的，这些系统都是围绕图书的流程展开的，就是说如何更好地利用新技术管理好图书。他当时只能聚焦在这里。但是，现在明朗了。这里讲2020年，有可能是2018年、2017年，现在这个几何级的发展趋势已经很明显。我看到一个数据，现在大部分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采购经费都在5-10%，高校及研究型的图书馆达到30-50%。

而现在相当多的图书馆还处在一个书本位的时代、纸质资源本位的时代，还没有进入一个数字资源为主体的全媒体时代，现在还是以图书为主的。一些研究型的图书馆已经开始进入数字媒体时代，达到50%以上了。美国研究型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采购经费平均已经达到58%，有一些可能更高了，尤其是那些以收藏科技医学类资源的图书馆。美国教育部一个报告预测，到2020年大学图书馆80%的购书经费将用于电子资源。我们现在距此还很远，绝大部分图书馆都没有变的意识。图书馆如何适应数字化发展的环境？这是第二方面的冲动。

顾晓光：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在变化，图书馆依然处于保守和传统的状态。

吴建中：是的，图书馆员这个职业是比较保守的，不善于变化的。这么多年来，无论外界出现多么大的变化，图书馆的变化很小，图书馆的变化只是量上的改变，质上的几乎没有。你看现在很一流的图书馆，包括国外的，它的流程、部门设置还是围绕图书展开的，比如采编部、读者部、典藏部等的设置。很少有图书馆是离开这个Paradigm（范式）的。尽管我们有些参考服务、讲座服务加入进来，但还不是主流业务。临界点来到之后，这个范式要不要变呢？

现在不论是信息资源还是知识资源，数字化占了很大比例。尽管纸质资源绝对数仍在增长，但占整个信息资源的比例是越来越小。如果图书馆员还死守着不改变的话，那生存的空间就很小了。我们的空间正在被挤压、被边缘化。如果我们的眼睛里只有这点资源的话，那么我们离自己的使命就越来越远了。图书馆的第一使命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资源的载体从纸莎草、泥板、甲骨、金石、竹简、缣帛等逐渐改变，然后发明了纸。纸发明到今天，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算起来也不长。我们不能把纸质资源看作是唯一的收藏，我们的使命是保护人类所有的文明记录，包括零次文献、隐性信息等。只不过以前那个时代纸质文献占了主体，所以我们常常使用“图书”这两个字来代表信息资源。现在很快就要进入以数字资源为主体的多媒体或者全媒体时代了，所以应该考虑变了，但现在思考变的人并不多。

所以，这本书也是想起这样一个作用，就是从原来以图书为主体的图书馆到人的图书馆的转变。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说没有准备好。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图书馆。从国际上来看，2005年虽不敢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但在这一年，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发表了“Perception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即《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认知报告》，大英图书馆也发表了“Redefining the Library: the British Library's Strategy 2005-2008”，即《重新定义图书馆：大英图书馆2005-2008战略规划》。这两个报告的关键词是认知，或者说品牌认知。图书馆是什么？人们重新反思。那个时候的反思对于以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图书馆人看到了这个认知，必须要变。这个变，国内没有跟上。在变的浪潮中最突出的是Rangeview，就是美国的创意型图

书馆。Rangeview是一个地区图书馆系统，原来有很多个分馆，后来政府经费削减，不得不将原来的系统打乱，重组图书馆系统。新馆长上任后，做了一个全新的Anythink图书馆。Anythink是Anything的俗语，但更突出思考的含义。它的意思是这个图书馆是创意型的，2010年12月还获得了全美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奖章。为了让图书馆更加亲民，“图书馆员”的称呼改成“看门人”、“牛仔”、“导读员”等称呼。还有分类体系，不用杜威分类法，改为更加简明易懂的、书店常用的“WordThink”分类法。它直接影响到图书馆的所有业务链，围绕读者需求和舒适度展开，全部变化了。读者认为怎么舒适，怎么方便，我就怎么提供。

还有，英国伦敦有个Idea Store（思想屋），实际上就是图书馆，该系统中的图书馆都按照新的创意设计，包括建筑上、服务上，全部发生变化。国际上这方面生动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芬兰赫尔辛基市图书馆的Library 10（因当地邮政编码为10而得名），也是按照读者需求设计的一个成功案例。该馆还有一个Urban Office（城市办公室）。该馆馆长说办公有第一、第二、第三办公场所之分。第一办公场所是传统的；第二办公场所可能在合作伙伴、客户提供的场所里；第三办公场所所在社会性的地方。受到这个启发，图书馆开设了一个社会办公场所，提供所有必需的办公设备免费向任何人开放。当然，他们人口少，比较容易处理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概念：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建设适应需求的“人的图书馆”。

这些都是在2005年前后发生变化的。2005年也是管理学中“品牌认知”最流行的时候。以后的每一届IFLA（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的会议，都在考虑变，改变图书馆的品牌，按照读者的认知度和社会的认知度来改变图书馆，这方面国内的介绍很少很少。国内只是抓住一些新奇的东西，比如说真人图书馆，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我们缺乏深刻的思考，人家为什么这样做，根子在哪里，精髓在哪里，我们思考得不多。

顾晓光：我们对“品牌认知”这个问题讨论和关注好像并不多，虽然图书馆专业文献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但没有引起业界足够的重视。

吴建中：我同意您的说法。2005年前后国际图书馆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轮没有跟上。我们一直强调国际化，我们的话语体系跟人家的话语体系真的不

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使命不了解，我们对自己的职业认识不深，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职业。我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长春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为什么呢？很多人关注的是现代化、高科技。我谈到了一个Paradigm Shift（范式转化）的问题，但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空的东西，应该抓技术发明和新产品之类的东西。

我们再来看看技术性的变化，比如说数字图书馆，我们数字图书馆走了十几年，没有走出一条新路。我们还在做扫描，做一般的检索。我们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如24小时自助借还机，但对于整体来说，没有大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很多技术都是按图书馆传统的要求来设计的，所以说这些技术是扭曲型的、让步型的，按照书本位的要求去设计的，比如说MARC，就是按照书的要求去设计的。其实MARC是电子的东西，完全可以发挥它的特长，但我们还是要求计算机按照卡片的要求来做，所以说它是扭曲的、让步的。

顾晓光：是不是有点“马拉火车”这种感觉？

吴建中：有点这种感觉。有些技术可能会花很多钱，有触摸式的，有大屏的，有的甚至要上百万，但大部分都是用来演示的。

顾晓光：更多的是一种形象展示？

吴建中：更多的是一种形象展示，对于整体没有影响，所以我要写这本书。写这本书之前我看了几本书，我想推荐给大家一本“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

顾晓光：这本书应该有中译本。有世界是混沌的意思（注：中文译本名为《新数字秩序的革命》，戴维·温伯格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

吴建中：图书馆界对它关注很少。这本书的作者以前做过图书馆员。这本书讲了三种秩序：第一种秩序，人们通过自己的想象把东西分类好，比如刀叉应该放在厨房的柜子里。任何东西的放置都是按照每个人自然的想象，它是物理形态的。第二种秩序是理性的秩序，科学体系或者科学分类，比如杜威分类法、国会图书馆

主题法，人类按照科学的分类，把知识放在一定的秩序中，它突破了绝对的空间性。第三种秩序是混沌中的秩序，被分类的内容和标签都在虚拟环境中，完全不受物理空间的制约。第三种秩序是自下而上的。第一种、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尤其是第二种。

顾晓光：第二种是金字塔似的。

吴建中：是金字塔似的。而第三种是自下而上，虚拟形态的分类法来分类虚拟形态的对象。它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一个事物是不是只有一个位置？每一样东西都是零碎的，但其中有Order（秩序）。我们过去完全按照第二种秩序，一本书只有一个位置，这曾经是图书馆员值得骄傲的地方，给每一本书一个确定的位置。但是到了第三秩序，一个事物是不是应该有几个侧面来揭示呢？有人说我们也发明过主题分类法呀。是的，但图书馆的空间是一个物理形态的空间，它只告诉你这个东西只能放一个位置，而且还要按排架法来排列。只是在检索时，它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Facet（面）。这本书告诉我们，千百年来我们都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单一的秩序，图书馆员也按照这个思维模式来管理信息，但网络允许我们用多维的方式来管理它们。



上海图书馆内景

顾晓光：事物的表现是多样的。

吴建中：多样的，多元的，混沌的。

顾晓光：就像现在交叉学科越来越多，比如图书馆学情报学，与很多的专业学科都有联系，但对于我们研究者也是一个挑战。

吴建中：按照我们原来的想法，你问一个问题，我回答一个问题，就结束了。但在第三种秩序中，你问一个问题，我回答一个问题，这个程序没有完，我们把“问和答”公开出来，然后任何人都可以回答，一个问题肯定有很多不同的回答。就图书馆来说，是不是更加Living（生动）？所以，这本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自下而上、非线性的方式。我再说得稍微远一点。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流水线的，即自上而下的，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数字化生产，是自下而上的模式，最典型的是3D打印机，它是可以打印物品的东西。比如生产一个特殊的杯子，可以在非洲某地设计，在欧洲用3D打印机刻制出来，然后再寄到中国来。这说明整个范式发生了变化了。图书馆员应该思考：范式变化了，我们该怎么变？

顾晓光：您刚才所讲的正是将图书馆的现状、未来的发展进行了一次思考。那我就您所讲，提一些小一点的问题。刚才您讲到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功能，比如国家图书馆是全国总书库，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也有意保存很多特色资源，包括家谱、上海本地的文化资源等。数字环境下，我们在保存上碰到了一些问题，相当两难的问题。在传统图书馆的资源中，我们拥有的是自有资源，但在数字环境下，资源可能不为我们所有，我们只是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资源不在本地，我们无法拥有它。当现实发生某种变化时，我们也许一无所有。这可能是我们很多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图书馆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里面也牵扯到与内容提供商博弈、商讨的一系列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建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拥有与获取的问题，我不可能收藏所有的东西。但是，我要尽量将这个地区有特点的东西收藏起来，这是第一层次的。从第二层次来看，我们收藏的东西是不是要变化？我们要为Stakeholders（利益相关者）服务，他们的需求是我们服务的重点。因为图书馆还有一个Intermediator（中介者）的使命，我们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完成，比如说本地有的，本地提供；本地没有的，我从外面获取。图书馆最主要的是满足现实的需求。所以，在数字环境下，图书馆的收藏方针要发生变化。国内的图书馆很少有馆藏政策，有了馆藏政策，你可以按

照需求不断地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因为经费的限制，有些资源是作为实体的收藏，有些是虚拟的收藏，还有一些是短暂使用，可以依赖外部资源。总之，读者的需求在变化，社会的需求在变化，图书馆也应该按照他们的需求来变化。

顾晓光：在数字环境下资源建设方面的思考越来越多，比如现在有以用户驱动采购为主的PDA政策，这在高校图书馆和研究型图书馆越来越多。在采访工作中，我们的采访人员会请相关的专家和博士生等人士参与进来。在目前的情况下，既要以人为本，资源采购又不可能有大的增长，公共图书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吴建中：每一个图书馆都需要有一个馆藏政策，并对外公示。读者不满意，就会逼着你修改。我们很多图书馆都有合作，我们也要告诉读者我们在其中的收藏，也就是资源分工状况。但总体来讲，公共图书馆的变化总是要慢一拍。因为其他图书馆的需求是特定性的，比如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是按照大学的课程设置和研究方向来组织的，而公共图书馆是面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它唯一的变化是按照年度计划做适当的调整，它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藏书方针。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一我们大家没有这个意识——有些图书馆为了表明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收藏重点，要保持下去，很顽固。而“人的图书馆”是按照社会的需求来变化的，你既要有第一层次的收藏，也要有适应变化的第二层次的收藏。从第一层次来讲，你要有自己的基本使命，要有本地区特色的馆藏，要保持馆藏历史的一贯性。但也要考虑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这一点很重要。总体上讲，还是要适应读者的需求，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我们需要去变化，但我们可能适应变化的能力很小、思想准备不足。

顾晓光：您在书中提到“人、资源和空间”三要素，突出人在图书馆的位置，整合全媒体的资源，发掘图书馆作为场所的价值。资源一直是图书馆安身立命之本，但如您所说，到了一个临界点，数字资源占到一定的比例，我们可能会流失越来越多的用户。目前，已经看到有这个趋势，很多中高端的研究者使用图书馆越来越少，因为获取资源的途径越来越多，那么“场所”或者“空间”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上海图书馆内景

吴建中：图书馆面临的最大的冲击是Disintermediation（去中介化），这是让我们最受刺激的东西。以前图书馆员的作用很大，人们的研究入口是图书馆，每一个做研究的人肯定到图书馆去。以前我听说国外有些博士答辩时，需要有一个图书馆员在旁边。为什么呢？图书馆员会问你有没有看过某些资源。而现在，研究者告诉我们，不需要你们了。而现在大部分的研究者是不是将图书馆作为第一选择？没有。也就是说图书馆正处于一个去中介化的过程当中。社会环境在变，但图书馆没有变，没有变成一个Heart（心脏）——大学的心脏，地区的心脏。10年后也好，20年后也好，核心问题还是中介化和去中介化的问题。我们图书馆员被边缘化了，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回到以前图书馆作为研究入口的角色，能回去吗？

顾晓光：越来越难了。

吴建中：越来越难了，您说得对。我们上图有几个骄傲的地方，就是在世博会所起的作用。大家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世博会，我国没有举办过世博会。我们把世

博会的资料收集起来，别人看了眼睛一亮，要了解世博会，去图书馆。这类成功的实例在国内还有不少。但这还是个别的案例。对于整个图书馆来讲，研究者不来了，因为他们通过其他途径可以获得所需资源。这对于图书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图书馆要保持中介者的地位，就必须改变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就需要牺牲掉“拥有”，而重“获取”。从图书馆员的心态来讲，最好自己拥有资源，而不希望是“获取”的资源。买这些资源的时候，心很痛，因为这是一时之需，作为国有资产就流失了。所以，每个图书馆都不希望“获取”资源占很大比例，而是希望“拥有”更多的资源，这是很正常的。要找回中介者的地位，使更多的人回到图书馆，我们需要做出牺牲，有时宁可让“拥有”的资源少一点，只要能满足用户的需要。这里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让用户意识到图书馆是必要的，做研究还是要到图书馆来。所以我们要努力发挥图书馆作为人和信息的中介功能。

顾晓光：是的，图书馆员的中介作用并非像搬运工一样，而是用自己的专业来辅助读者获取他需要的资源和研究。我打个比方，Amazon（亚马逊）已经打通了出版的相关流程，读者用60秒钟可以下载一本图书，并且还可以做自出版。作者提交作品，亚马逊进行发布。但其中的编辑工作却不可替代，一个好的编辑会是一本书的第二作者，他对于图书质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亚马逊是很难有如此多的编辑力量来进行此项工作的。

吴建中：我认为亚马逊想替代的不是编辑，是出版社。编辑是需要的，知识生产需要作者和编辑，但亚马逊想把出版社排挤出去。出版社也是一个中介，它不需要出版社这个中介了。出版商和图书馆员一样，都是保守的。在数字出版方面，出版社是很保守的，最不愿意向图书馆提供电子书服务的就是出版社，他们是抵触的，想守住以前的地位，但守是守不住的。亚马逊要把出版社这个中介地位排挤掉，但不可能被完全排挤出去，因为出版也是一门专业，这和图书馆有些相似。

顾晓光：出版社的出版流程和图书馆的信息传播流程差不多。亚马逊、Google（谷歌）和出版社、图书馆中介化的作用是差不多的。

吴建中：是差不多，您说得对。

顾晓光：刚才讲出版社的编辑有智慧投入在图书里，图书馆员服务读者时也有智慧投入，来影响读者的研究深度。现实是，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研究者根本就不想去寻求图书馆员的帮助，并不关心你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办？



上海图书馆内景

吴建中：把读者拉回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体形态的，比如说拉住现有的读者，发现潜在的读者。但人家不来怎么办？光来看书吗？你有多少值得我看的书呢？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从国际图书馆发展的大趋势来讲，以前重流通指标，比如图书的借阅量有多大，现在更重社会活动的指标，比如，有多少阅读活动，多少讲座和展览，多少研讨和交流活动等。如今更强调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作用，让读者来到图书馆参与更多的社会交流活动。以前讲座和展览被认为是非核心业务，现在变成了起主导作用的核心业务，也就是说市民参与图书馆组织活动的数量应该成为今后更主要的指标之一。怎么拉回来？我们还要从深度上做文章，在资源上吸引读者。比如说某个大学有个新的专业——纳米技术，图书馆就要竭尽全力收集与纳米有关的资料，告诉他们我这里是纳米资源的中心。最近图书馆做得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发展了Information Commons（信息共享空间），信息共享空间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回来，你要资源，要上网，要交流，那就到图书馆来。在这里你可以喝咖啡，和同事闲聊，向专家请教，你还可以给别

人上课，比如信息共享空间里一般有投影仪，你可以借它的设备做PPT演示。很多图书馆都在做努力，把读者拉回来。还有一种是用虚拟的方式找回读者，现在很多图书馆都在利用社交媒体，开展交流活动，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找回读者。

顾晓光：对于信息共享空间来说，我们有自己的场所优势。我很同意吴馆长的观点，图书馆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它的前景也不明朗。今后图书馆通过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好还是可能走向消亡，莫衷一是。我在刚刚结束的苏州大学数图会上听到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欣女士谈到关于图书馆发展的一个观点：“尽管我们的许多服务非常重要，没人说一定该我们来管。”现在已经有信息提供机构代替了我们的工作。

吴建中：图书馆要把读者拉回来，首先必须提升自己。比如说过去没有参考咨询，它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本来图书馆是提供书，读者来看。图书馆员有责任告诉读者资源在哪里。一开始我们做Current Awareness，就是新书通报，继而觉得新书通报不够，我还可以为读者做更多，所以有了参考咨询，参与解答读者的问题。这样我就必须提升自己，所以相应地就有了参考馆员和主题馆员制度。上图和上情所合并后，又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知识服务，就是参与解决别人的问题。当然作为图书馆员来讲主要是提供线索，不提供回答。但做得更深一点，我们可以参与解决，甚至帮别人直接解决问题，比如说根据人家的需求做咨询报告或研究报告。知识服务有四个方面：一是参与政府的决策咨询，二是为Research Community（研究群体）服务，参与他们的调查研究活动，三是参与到企业、个体企业主的生产当中，四是更重要的，参与到广大民众的知识更新中。总体来讲，我不是解决你的问题，而是参与到你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从参考服务到咨询服务，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业务水平，目的是为了拉回我们的读者。拉回读者的同时，也提升了图书馆员自己。所以这是图书馆员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说其他可以外包的话，参考咨询是不能外包的。而此类服务也不过百年的历史，我们讲图书馆员的责任也好，使命也罢，也要跟着发生变化。

顾晓光：图书馆的功能是一直在变化的，它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就像我国一百多年前，图书馆还是

藏书楼的概念。从这种变化来看,我们好像是在迎合读者,不管是做形象工程还是内心的职业诉求,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无限制地迎合读者。您如何看待“用户永远是正确的”这种观点?

吴建中:从大的方面看,是的,但不能说某个具体的用户是正确的。这个观点容易被绝对化。我顺着这个思路,迎合用户是需要的,因为本来就是用户出钱建图书馆的,我们是依附于设置母体的,应该去迎合设置母体、迎合读者的需要。但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我们要引领读者,引领需求。这是艺术,大部分图书馆是做不到的。我综合了所有需求之后,就知道读者下一步想要什么,然后我应该告诉他们,应该研究什么东西,所以引领很重要。

顾晓光:Web2.0在信息时代中的位置虽不是革命性的,但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将自上而下的信息发布变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由此引发了图书馆2.0在国内研究的热潮,包括刘炜副馆长也在极力推动此类研究和应用。同时一些图书馆也进行了相关的应用,比如上图也有应用,包括通过豆瓣这个以分享读书和电影的网站,将上图和上海地区其他图书馆的馆藏信息展示在相应条目页面。但作为用户参与为理念的图书馆2.0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吴建中:图书馆2.0是跟着Web2.0而产生的,Web3.0的出现会比较晚,当XML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可以一下子进入XML时代了,甚至Web3.0就在眼前了,但是这个时间等得太久了。连万维网的发明者Tim Berners-Lee(蒂姆·伯纳斯-李)也说,现阶段有必要逐步完善HTML,试图让全世界一下子改用XML是行不通的。图书馆2.0只是一个概念,强调我和用户是互动的。比如说OPAC里应该要有互动,但这需要整个范式发生变化。前一阵子流行Web2.0、图书馆2.0,虽然现在说的不多了,但并不意味着要过时了,这种模式还要存在下去。关键在3.0。Web3.0和图书馆3.0强调的是读懂信息,2.0以前是Readable(可读),3.0是Understandable(可懂),就是元数据、本体论。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历了三个时代,一个是卡片的时代,一个是MARC的时代,一个是XML的时代。卡片的时代是人可读,机器不可读;MARC的时代是机器可读,人不可读,我是说一般人看不懂;XML是人可懂,

机器也可懂。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知识本体,我们把它应用到知识库当中,知识库就可以按照人的需求来自行组织,更加智能化了。

顾晓光: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很流行“SoLoMo”(社交+地理位置+移动),比如打开手机,可以寻找最近的饭馆在哪里。目前还出现一种应用是非社交化的,但它会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员,通过记录我们日常行为的信息来推送相关建议。美国有个公司推出一个叫Placeme的应用,它通过地理信息采集到用户行为方式,然后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私密助理。有个事例可以说明:有一天早晨因为重感冒没有去公司上班而是赖在床上的情况下,它提醒你私人医生的电话。因为根据它的记录,你每个工作日的这个时间的位置应该是在公司园区的停车场或咖啡间,而不是在自家的卧室里。

吴建中:所谓真正智能化的时代是懂的时代,不是可读的时代。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可读的时代,还没有到一个懂的时代。图书馆员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是因为Web3.0上没有突破,更不用说图书馆3.0了。这两年为什么本体研究的进展这么慢,本体真正进入实用化的很少?图书馆员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将我们的分类技能很好地应用到计算机当中,应用到网络当中。应该说我们是有条件的,但是这条路很漫长。包括Google的副总裁也说,计算机无法告诉你世界上10个最深的湖是什么,只有到了Web3.0的时代,它才会通过语义关联告诉你。

(背景链接:Google曾经承认:她并不会总是懂你。如果在搜索栏中输入“the 10 deepest lakes in the U.S.”(美国最深的10个湖)时,她将优先向你展示基于这些单词或者词组权重最高的句子和网站,Google的同事和其高级副总裁Amit Singhal说Google不明白那是一个问题。我们能做的只有交叉双手然后祈祷有个家伙曾经在網上写过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或者话题。)

顾晓光:美国国会图书馆明年三月底将会使用RDA,但国内除了不多的研究者之外,还看不到图书馆应用的可能。您如何看待RDA在中国发展的可能?

吴建中:我刚才说图书馆界是比较保守的。但IFLA看到这个趋势,马上就抓住它,然后竭力推广,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RDA的推出有文化上的原因。为了

克服AACR2英美本位的问题，大家都在探索超越英美本位的一般通用规则。RDA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它使编目从平面化向立体化发展，从单一型向关联型发展。有人说这个新的手段用起来很难，我看了RDA后，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重要的是RDA给予你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可能性，更丰富的描述方式，为什么不去尝试用它呢？我是希望紧跟RDA，我们已经考虑在做，尽快跟上国际编目发展趋势。

顾晓光：现在MARC还是主流，虽然编目员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喜欢MARC，读者对于数据的要求也没那么高。

吴建中：因为图书馆员不善于变化，是比较保守的。

顾晓光：这两年图书馆技术应用有两个热点，一是移动图书馆，二是发现系统。上图在数字服务上一直走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的前列，也是最早进行电子书阅读器借阅的一个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论坛》曾经刊登过上图同仁关于阅读器借阅的文章。现在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提供移动阅读设备，开发或应用移动系统。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图书馆在网络服务上做了很多努力，但从全世界的图书馆来看，图书馆的网站不怎么吸引人，用户界面没有那些商业网站友好，独有的资源量不够大，传统的OPAC检索范围又仅限于馆藏，与社会网络资源的融合不足。现在很多图书馆越来越用心地去完善它，比如集成系统的更新应用，比如将其做成一个城市的学习中心。在这其中，发现系统是目前业界关注度很高的一个话题。您怎么看这两个应用？

吴建中：先说移动图书馆或者手机图书馆，移动图书馆就是一个虚拟图书馆。这是一个老话题，只不过是载体发生了变化了。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移动图书馆。现在手机用户近10亿，这里面多少人持有智能手机？现在可能不多，但发展会很快。现在农村的年轻人用智能手机的反而更多，因为他们缺乏资源，更希望通过它获得资源。对比这么多的用户群，我们图书馆的用户群有多少？上海地区图书馆的读者证持有者只占上海总人口的8%，这在国内大城市来讲还算是多的，所以不能忽视手机用户这个群体。今后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肯定是要融合的，技术上也会走向融合，所以对于图书馆

来说是借用移动的技术及其平台，我们自己要做的还是内容。移动图书馆也是拉回读者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要赢得更多的虚拟读者。

讲到这里，要讲到电子书。在这方面，图书馆落后了。以前数字图书馆考虑的更多是扫描，把馆藏资源做成数据库，在技术上没有很大的突破。现在电子书，主导权和话语权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像出版商、代理商，比如美国的Overdrive，它就是电子书的代理商，亚马逊也是代理商。图书馆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有主动权。比如上图有新技术体验中心，我们在思考如何超越，不能老是跟在人家后面。我的书里也提到了3M公司跟图书馆合作推出跨平台的阅读器，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跨平台的系统？汉王、盛大等公司的资源采用不同格式，因为要保护各自的知识产权。但是对于图书馆来说，我们是站在读者利益之上的，能不能有一种跨平台的、不依赖于某一系统的格式？我想可以有的。你看现在移动图书馆或者电子书管理内容的系统是按照运营商的要求，而不是按照读者的要求来做的，图书馆应该在这方面更有作为，我们能不能提供一种通用的阅读格式来满足读者阅读不同格式的要求？这一点做到了，那么读者手上的各类阅读设备都可以激活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突破。

顾晓光：现在国内电子书的市场有些畸形。比如汉王，它的移动阅读的销售主要靠硬件，与内容的捆绑不够，因为盗版严重，用户没有养成付费阅读的习惯，这些公司的用户界面做得也不够友好，用户体验较差。我试用过当当的数字图书馆，它的电子书阅读平台做得很粗糙，资源量也不大。刚才您提到一些大型出版商，它们很多电子书不提供给图书馆。去年出版商HarperCollins发布新规定，电子书被图书馆借阅26次后，便达到借阅量的上限。这对于图书馆来说很无奈，很无助。虽然也有图书馆与版权方签订协议，按读者的访问资源数量和程度计费，按件计费，但整体上看，我感觉像亚马逊这样大的集团真的可以甩开图书馆了。

吴建中：是的，对图书馆是一种挑战。但从Core Value（核心价值观）来讲，图书馆有优势，它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我完全站在读者的利益免费向你提供。我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捍卫读者免费获取信息的权利，任何商业性的机构不可能有这个价值观。我们要守住，虽然现在守的空间很小，但是还要坚守住，最终读者肯定

是拥护的,读者希望有一个公共的地方为我们提供无差别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使命。Google和亚马逊肯定是商业性质的。图书馆面临Dilemma(两难困境),既要保护读者的利益,又要保护国家的利益。所谓保护国家利益,是指保护知识产业的发展。如果资源都被拷贝了,都被免费了,知识生产就停顿了,知识生产者就没有积极性了。既要保护知识产权,又要保证读者能够更加方便地免费获取信息,给图书馆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课题。

顾晓光:是的,特别是在创新的环境下更要保护知识产权。这还让我想起了众多国家的信息服务机构抗议国外数据库商逐年高比例上涨资源费用的行动,国外还有学者专门建网号召学界抵制数据库商高额费用。他们的理由不仅是价格高,而且是利润率太高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绑架了信息服务机构,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建中:这有点绝对了。你站在它的立场上想,它需要一个Business Model(商业模式),知识劳动的付出以及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它要取得平衡,你不能说它完全绑架了我们。我们要理解它是按照商业的市场化在走,如果它卖不出去肯定要降低的。问题在源头上。大学图书馆是不是还是大学的心脏,不是,大部分有知识产权的资源不在大学的图书馆,而在商业的、学协会

的机构中,这些机构强过了公共的机构,它们才是实际上的学术中心。Open Access(OA,开放获取)运动因此应运而生,其目的是让更多的学者把知识放在公共的平台。但这个运动也要找到平衡点,也需要一个商业模式在里面,除非国家不断地给你钱。现在OA需要作者支付发表费用能持续多长时间?

顾晓光:是的。目前OA的运行还是主要靠作者支付发表费用和科研基金这两方面来支持。

吴建中:对。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商业模式绝对错了,也不能说OA运动绝对是没有障碍的。问题是图书馆需要从中吸取什么,我们是不是还是一个学术的中心、一个地区的核心。如果图书馆是核心的话,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过去资源都在大学和学术机构里,不在商业机构里。现在要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OA中,参与到机构库中。对于图书馆来说,需要更多地获取第一手的资料。机构库就是基于OA的,它的出现就是与商业机构抗争的,而且机构库不仅收录静态的知识,还有动态的知识、头脑里的知识。中国大陆的机构库太少,台湾地区比较多。我们在与代理商或出版商的抗争中,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地位,你不行的话还得依赖它们,因为读者需要这些信息资源啊。



上海图书馆内景

顾晓光：今年4月17日，哈佛大学Faculty Advisory Council向全校教师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具体请参见：<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1136&do=blog&id=579151>）。由于学术期刊的价格持续上涨，尤其是某些大的出版集团的价格垄断行为，大学图书馆面临很大困难，传统的学术交流模式在经济上已经是不可持续的。针对这种现状，并向全校师生提出9点建议，其中包括将学术成果提交到DASH（哈佛的机构库），考虑投稿给开放获取期刊等等。由此看到，商业的出版机构给图书馆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该怎么办？您刚才说的机构库我们做的还不够，这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因为商业数据库目前占有大量独有的优秀资源。两年前，我国众多信息服务机构的管理者在抗议Elsevier高额的订阅费中，取得了一点作用，双方都有一些妥协。

吴建中：市场化是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运行的杠杆，不能去违背它。你去对抗它，需要与它竞争，我们要向国家建议公费支持的资源不能到商业性的机构出版，应该免费向大家提供。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实际上是培育自己的核心价值、核心竞争力。如果说我们成为了学术中心，也就吸引读者到我们这里来了。但是不可能把商业机构消除掉，因为市场化会有一个平衡，我们要找到平衡点，同时要相互理解与合作。

顾晓光：是的。图书馆有个优势是集成了很多资源。Elsevier虽然好，但我们不但有Elsevier的资源，还有其他优秀的资源。不知道这个比喻是否合适，Elsevier是个精品店，但我们是一个大商场，从节约用户的时间上讲，我们这里有优势。另外，在节约用户的时间上，很多图书馆推出了发现系统。高校已经有些图书馆在应用，它集成了很多国外数据库资源。

吴建中：说得对。这就要超越，超越是一个时代的主题。IFLA的不少研讨会都冠以Beyond Libraries（超越图书馆）的主题。发现系统不仅仅是整合馆内的资源，而且是整合网络的、社会的各种资源，它的基础是元数据。从技术上讲，它是创新的，它将馆内馆外的资源整合起来，是发展的一个趋势。问题是怎么把发现系统的内容资源做好，图书馆员要有作为，要在源头上将标签、关键词等描述方式做好。告诉作者，你发表东西的时候，尽可能多将关键词表达出来，以后本体做得好

的话，这些工作就可以让系统来做了。总的来讲，发现系统是一个超越性的东西。

顾晓光：苏州大学数图会上，三大发现系统（Summon、Primo和EDS）的服务商也都有发言，还有电子科技大学的秦鸿有一个三家的评测，里面提到它们各有利弊。图书馆网站中的搜索栏非常重要，发现系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途径。我听了几个馆长对此的意见，他们并不排斥，但发现系统还没有推广开来，很大程度是因为价格有些高。

吴建中：问题在性价比，怎么看待成本效益。如果你的效益大于成本，你会去做，如果不是，你就不会去做。但大部分图书馆没有准备好，这个系统可能是个摆设，你这个系统不适应我整个图书馆系统，因为我可能没有更多的资源和相关环境。我们有自己权衡的尺度。我举一个上图以前买Horizon的例子，一开始Horizon提出几十万美元的价格，我们一听吓一跳，一个软件系统怎么这么贵。当时是在1995年左右，但我们买了，因为从成本效益来讲，我们是合算的。我们的业务链是面向新系统的，现在看来，这条路走对了。发现系统呢，要看你图书馆有没有准备好，如果你有这么多的资源和服务跟它配合的话，我想买还是合算的，但现在大部分图书馆从技术上、思想上是没有准备的，而且价格太高。

顾晓光：是的，虽然价格是商业机密，但通过国外公开的数据来看，确实不便宜，而且维护费用也不低。从我使用来看，还不错。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聊胜于无的东西，虽谈不上完美，但方便很多。不过发现系统给的搜索结果太多了，我们看Google的搜索结果才几页？这就需要发现系统更多要考虑数据如何排序的问题。读者是不关心你投入多少的，只需要知道它有没有用。

另外，图书馆与商业机构并非只有买卖关系，还有很多非商业化的合作，比如刚才所说的豆瓣图书上有上图书目信息的链接，还有上图与盛大公司也有关于电子书方面的合作。请您谈一谈。

吴建中：首先上图是开放的，愿意与任何机构进行合作。跟盛大的合作是一项突破，突破点在于盛大有独有的网络文学。盛大的网络文学是收费阅读，一个新的阅读形态。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免费阅读，而且能够让读者较快地得到连载过程中的最新资源，这就是上图

的创新了。除了愿意与任何机构合作,我们也愿意尝试新的东西,不过要考虑新的东西有没有可持续的价值。如果只是一个一两年的东西,我们不感兴趣。如果这是一个有未来前景的东西,我们愿意尝试。我们把握的原则是可持续的、开拓性的。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项目,根本是开放。

顾晓光:您于2001-2005年连续担任了两届IFLA管委会委员,刚才您也谈到2005年认知报告的影响。您担任IFLA领导职务这几年,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图书馆相关技术、应用及理念变化很大的阶段。请您谈谈在IFLA工作的情况。



上海图书馆内景

吴建中:我觉得参与IFLA对我来说感触最深的是参与到它的决策过程当中。这对我本人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过去讲国际化,更多是象征性的。到了这个平台,怎么去争取话语权?比如说Caucus Meeting(即由相关语言或国家组成的团体在国际图联大会期间进行协商的会议)增加了中文,Chinese Caucus Meeting,就是我任期时做的推动。我也参与了中文变成官方语言的推动。到张晓林馆长任期时,中文最后成为了官方语言。除了争取话语权,同时还要向国外同行学习。上管委会讨论的都是大问题。而大的问题,都是引领性的。我接触到的都是一流的人才,看到的都是战略性的报告。各个委员会的战略报告都要通过管委会。比如多元文化委员会做的报告,我看到后,就上图尝试了多元文化服务。这些与参与到决策层是分不开的。

这使得我可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视野上观察问

题。有人说,你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国外的东西,因为我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观察和思考。国际化非常重要,如果大家都有一个国际化意识的话,不至于2005年这一系列的重要报告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人家在变,是穷则思变。我们得到文化大发展的恩惠,现在是投入最多的时候,但没有思考变,我们要有危机感。以后文化的投入会减少的,因为如果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都达标的话,文化的投入就不会有这么多了。这本书也是在起一个警醒的作用,我们要变。人家在变,是因为没有钱了,我们不变,是因为我们太有钱了。

顾晓光:上图的二期有什么规划?

吴建中:已经有规划,二期已经进入市委的工作要点报告。我们不想简单地建一个二期,而是希望二期是一个体现图书馆员中介者价值的、无所不在的图书馆。

顾晓光:会有一个超越?

吴建中:应该要有超越。你看现在我们的阅览室分布:人文社会科学阅览室、自然科学阅览室等,以后不可能了。以后会是一个个专题的阅览室,以主题馆的方式来建设,里面会有静态、动态以及人头脑里的资源汇聚,首先是人与人交流的中心。这对于馆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要你更好地服务这个思想库、知识库。

顾晓光:未来的图书馆对于馆员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国内图书馆的实践和图书馆学教学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一方面图书馆学的教育为图书馆输送了什么样的人才以及很多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不把图书馆作为职业的第一选择,另一方面,有些图书馆不愿意接收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学生。现阶段,我国没有一个图书馆员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来保障图书馆员的职业素养。您不仅是一位管理者,也是一位学者,如何看待行业与专业的这种关系?

吴建中:这造成了恶性循环。从源头讲,图书馆本身不争气。一个是图书馆的工作环境不争气,一个是图书馆员的社会地位不争气。图书馆员不是公务员,很多国家的公共图书馆员是公务员,而且像美国图书馆员必须是硕士。我们不是,从教育角度,必须考虑市场,如果

这个市场没有吸引力，毕业后就不会去。而且，我们热衷于改名，像南开大学，改了好几次名：1987年从图书馆学系改为图书馆情报学系，1994年再改为信息管理系，1999年改回图书馆学系，2005年再改回信息资源管理系。原因是现在公众对图书馆的认知不好。有些地区建图书馆还不想用“图书馆”这三个字，我说一定要这三个字，这是个观念问题。为什么不要？是总觉得图书馆地位低。我在世博会期间，CCTV记者采访我时，最后他问我学什么专业的，我说学图书馆学的，他接不上话了，可能想图书馆学专业怎么来谈文化创意？所以我们的认知要改变。2005年，国外在变的时候，我们没有跟上，我们差了很多年。我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国际化，真正地看到我们的位置。

顾晓光：还有一种说法，图书馆如果改变是找死，不改变是等死。

吴建中：有意思。不过我还是看好。人家说图书馆员去中介化，我们的底线是不要边缘化，我们还是要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核心价值，你立足的

空间就没有了。从边缘化走到中心，你需要花多大的力气？我告诉我们的员工，尤其是年轻的员工，再要回到过去的地位，你要跑步的，光走是不行的。

顾晓光：正如您所言，我们要有危机感，很多图书馆也出现了加班很严重的情况。作为管理者，在考虑“以人为本”的时候，“人”不仅是用户，也含有图书馆员作为服务主体权益的考量。在上世纪末上图率先推出了365天开馆服务，当时《新闻联播》做了报道，由此引发了此后多馆进行的全年无休服务。在方便用户的同时，也有一种反对的声音：作为一个非特殊行业的服务机构，图书馆员应该享有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权利。即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也很难见到365天开馆服务的。经过十多年后，图书馆在整个社会的信息服务发展下，已经可以多样化地进行服务，包括7×24的网络服务。

吴建中：365天开放与否不是根本问题，因为通过换班，可以解决员工休息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拉回读者的措施，如果一个图书馆可以做到7×24的话，



上海图书馆内景

没有必要做到晚上八点钟闭馆,提前一点也可以啊。国外很多图书馆每月都有一天闭馆,他们很有自信,也能够提供很好的服务,读者也不反对。我们没有别的手段了,只有这个手段,让读者知道这个空间可以开放到晚上八点钟甚至十点钟。如果我们资源更强、手段更多、底气更足的话,缩短一些又如何?还有虚拟空间可以补偿啊。我们现在缺乏更好的方式让读者信服图书馆是必要的。当然,这句话可能会有误导,在没有更好的方式之前,还是要增加服务时间,吸引更多的读者来馆。

现在是怎么样确保员工的地位。通过确保员工的地位,让员工体面地工作,然后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价值。如果员工收入很低却又让他们拼命工作,这是折磨他们。作为馆长,我们要向上级争取,让社会知道这批人是知识劳动者,应该有更好的收入。作为图书馆的管理者,关心员工是第一位的。如果员工不能与你一起努力工作的话,还谈得上什么专业地位和社会尊严呢?

顾晓光:您怎么看待颁布在即的《公共图书馆法》?

吴建中:这次的《公共图书馆法》是象征性的。我们不能说它对图书馆举办者会有多大的制约或者说对事业会有多大的激励,只能说有了这个法就有了一个基础,我们可以不断地去修改和完善。

顾晓光:这个法更多是保护读者的还是保护图书馆员的利益?

吴建中:法是制约性的,首先是用来制约地方政府的。比如多少人口必须有一个图书馆,否则就是违法。现在没有这个法,图书馆的建设就靠政府管理者的心情,所以法是保护大众、制约政府的。有些人认为这个法没有多大作用。上次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会上,我说不要再发不同的声音了。如果这个法不通过的话,对我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有了公共图书馆的法,以后还可以有大学图书馆的法。尽管是象征性的,但它是一面旗帜,值得高高地举起来。

顾晓光:1995年,上图和上情所的图情一体化开国内先河,但到目前来看,并未形成一种风气,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图情一体化的优势在哪里?

吴建中:上图和上情所合并的最大好处是优势互补,也是拉回读者的一个方式。原来,我们只有最基本的服务。通过合并,我们加强了咨询服务和情报服务,现在我们在强化这个知识服务,即如何更好地将知识挖掘出来,为更广大的利益相关者服务。但是,我还要强调图书馆员不仅是回答别人的问题,更要参与回答别人的问题。随着来自读者的问题越来越深,你的回应能力也要越来越强。所以,馆所合并的最大优势是我们参考咨询的能力加强了。现在很多政府机构和企业愿意与我们合作,看重的是我们的资源和人才。最后我讲一下图书馆员这个职业。像医生、律师地位很高,本身能力很高,他们不依赖于资源和设施。医生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给你看病,律师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并不依赖于场所。而图书馆员过分地依赖场所,如果他有很好的知识整序能力的话,也可以不依赖于物理的场所,他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给你指导,所以图书馆员本身需要变化。要向其他的专业学习,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要培养参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顾晓光:现在的学科馆员就是要走出去,走到所要服务的群体中去。

吴建中:学科馆员或者主题馆员,都是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提供服务。我们这方面的意识增强了。我们和其他图书馆不一样的地方是参考咨询和知识服务的能力提升了,我们现在的一些馆员已经具备了知识服务的能力,我们的管理就要适应这一趋势,加强创新与转型。如果我们的工作诸要素都向这个方面转型了,那么转型就成功了。我们也希望建一个高效的、提供知识服务的图书馆,我们还在努力,需要技术,更需要思想。我们需要有这方面的理念,使得图书馆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至于国内没有形成图情一体化的潮流,主要是因为行政因素吧。合并了机构就少了,但有谁真正愿意减少机构、减少领导职数呢?当然各地有各地的想法,我这只是一家之言。上海图书馆之所以磨练出了知识服务的能力,与图书馆和情报所合并是分不开的。

顾晓光:谢谢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等会儿我还要与赵亮见面。

吴建中:顺便说一句。昨天我和赵亮(上海图书馆系统网络中心副主任)聊天的时候,共同谈到了一

个词: Relationship (关联), OCLC不是有本书讲追求同步吗? 它说过去我们讲Reference, 而现在提倡Relationship: 在混沌的环境中, 我们如何找到秩序。其实作为知识整序来讲, 每一个信息都与其他信息有关联, 而我们就是要努力把这些关联理出来, 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让每个东西都有它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前在资源描述时主要考虑它物理的位置, 没有考虑它虚拟的位置和关联度。关联的问题并不限于资源描述, 还有信息服务, 也强调关联, OCLC《追求同步》这本书就是对参考服务讲的。总之, 混沌是永恒的, 秩序是相对的。图书

馆建立一定的秩序, 并不是要固化它, 而是要丰富它、发展它。人类一直试图规范一个混沌的大千世界, 尤其是想用自上而下的体系去约束它, 但一旦人们发现一切都被机器化、格式化之后, 相反这个世界就没有那么美好, 所以混沌不是坏事, 多样性激发创造和创新, 我们要善于自下而上地去建筑一个更为多样化的世界。

顾晓光: 谢谢吴馆长。

吴建中: 谢谢顾老师, 欢迎常来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外景

(访谈日期: 2012-06-13)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简介

上海图书馆是一个研究型公共图书馆,建于1952年。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是一个综合性科技情报研究和科技查新服务单位,成立于1958年。1995年10月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成为国内第一个省(市)级图书情报联合体。

上海图书馆新馆1993年奠基动工,1996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其占地面积为3.1公顷,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主楼由58.8米和106.9米的两座塔型高层和五层裙房组成。多维台阶式块体顶部造型如同自然生长的台阶,象征着文化的积淀和人类向知识高峰的不断攀登。

上海图书馆拥有设施完善的阅览室、个人研究室、展览厅、学术活动室以及报告厅、多功能厅和音乐欣赏室等;采用现代化文献采访、编目、流通、书目查询等功能的计算机集成管理和服务系统;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助推读者的阅读,相继推出外借数字移动阅读器、手机图书馆、电子阅报栏、网上委托借书、“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无障碍阅览室等现代化数字服务新举措。“新技术体验中心”在传统业务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多元化、人性化的服务体验。

上海图书馆馆藏丰富,门类齐全,拥有图书、报刊和科技资料5200余万册(件)及15万余张老唱片等非书资料。上海图书馆为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所在地,馆藏历史文献370万册,距今1400年的《维摩诘经》是上图最早的藏品;拥有家谱2万余种计20万余册,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最多的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实行免费办证,坚持“360行,行行可以办证;365天,天天对外开放”;探索现代图书馆的多元化服务形式,形成了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服务体系、上海公共情报服务平台、“上图讲座”、“上图专递”、“上海之窗”、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上海年华、馆藏文献精品年展等十多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现代服务品牌,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上海图书馆以“积淀文化、致力于卓越的知识服务”作为组织使命,以“精致服务、至诚合作、引领学习、激扬智慧”作为核心价值观,向着“世界级城市图书馆”的目标迈进。

馆长简介

吴建中,男,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197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1982年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1月起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主要社会职务有: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全国社科基金评审成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会长,曾任国际图联管委会和专业委员会委员(2001-2005)。出版有《21世纪图书馆新论》、《国际图书馆建筑大观》、《世博会主题演绎》、《和谐的进步》、《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等著作20余本。